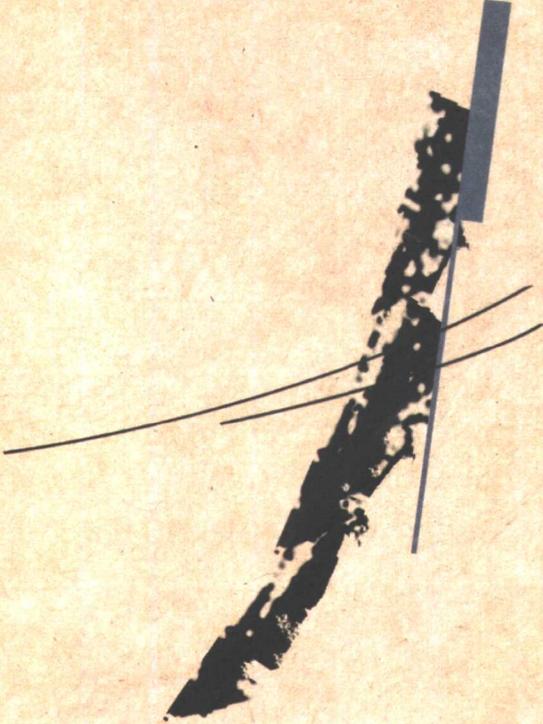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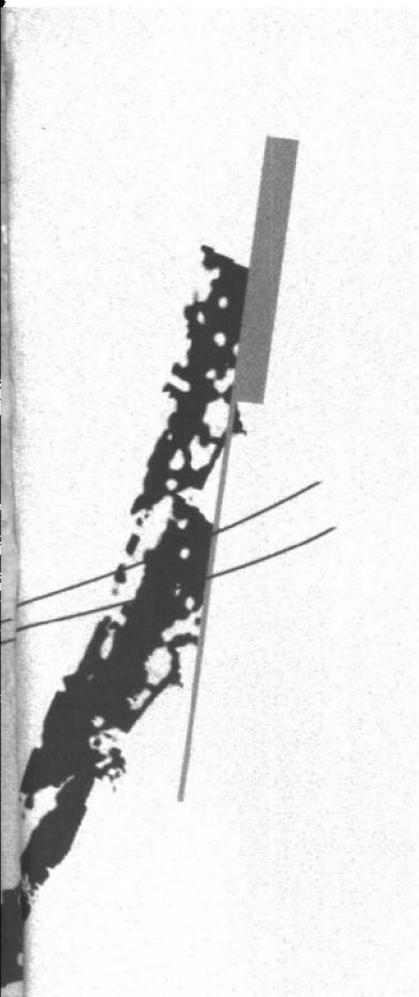
激进民主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C. 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激进民主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 (C.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进民主/[美]拉米斯著;刘元琪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7-300-04359-3/D·689

I. 激…

II. ①拉…②刘…

III. ①民主-理论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IV. ①D 082 ②D 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199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激进民主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C. Douglas Lummis) 著

刘元琪 译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 crup. com. cn

人大教研网:www. ttrnet.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1.5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88 000

定价: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Radical Democracy
C. Douglas Lummis
Copyright ©1996 by Cornell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康奈尔大学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

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 and 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为《激进民主》中文版写序。我也很想知道今天中国的读者如何看待这本书。当我写作时，我心中最初设定的对象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读者。很自然，这本书是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为背景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著作，即是说，它既被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主义也被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所产生的幻灭感所影响。

激进民主力图表达的是一个特殊的美国问题（称呼它是一个“美国问题”，我并不是意指它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因为美国有办法将它的问题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就是，大多

数美国人，不仅一般的民众而且社会科学家对于民主真实意义的理解很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虽然民主的本意是指人民拥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却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发展出来帮助人民赢得和拥有这种权力。由于很多这样的制度（宪政、由法律确立的人权和定期选举等）在美国已经建立起来，美国人就易于将“民主”等同于他们自己那一套政治制度。于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还是反抗国家权力的人们之理想的民主就演化成为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人被教导成持这样一种观点——民主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投票选举这个或那个政党来轮流统治这一超级大国（或被这一超级大国统治），并支持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外的“保护民主的战争”。

第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被这样教育——平等的民主理念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自由就是自由市场，以至于任何通过把资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方式来矫正自由市场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做法都被看作是非民主的甚至是独裁的。在这种世界观的笼罩下，人们很难理解到经济体系本身也能成为一个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人们比如工人被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所统治。

这本书（像我在第一章中所写）呼吁“正名”。我从孔夫子那里借来这一术语，虽然孔夫子的原意与此大为不同。这本书呼吁回归到民主的原意——人民的权力上去。我们应将这个词从那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手中夺回，将它归还给人民。我认为，不应该将民主看作一个已经建立的制度性的权力体系，而是应看作“一项还有待实现的承诺”。这一承诺特别在经济领域还没有实现。工厂民主化的问题，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工人们都努力斗争以求解决，但是在21世纪它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问题。

为实现正名，本书往西方特别是英美历史深处挖掘，以唤起人们，使他们认识到：民主在历史上曾经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一个理想。它指出，定义为“人民权力的民主”不是一个新的思想，而是恢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当然，所有这些论述本来是面向西方的。我能肯定中国读者将在这本书中发现很多不适用于他们状况的内容。提出要注意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可能不利于说服那些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人们。如果对中国历史有丰富的理解的某位能够为中国读者写作一本和本书意图类似的著作，它肯定和这本书

不一样。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书可以写出来，也许已经有这样的书了。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权力，而不是取得权力的任何一种特定的制度，那么这种理念的根本精神肯定能够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就像没有任何有机体自己去寻求疾病一样，没有任何民族会去寻求衰弱、压迫、剥削和堕落。如果这是我的一种倾向，那么就让它吧：这正是我的信仰。同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肯定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传统已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这本书主张马克思的解放哲学的伦理基础是民主（像马克思年轻时候所公开表达的一样）。资本主义发展的缺陷是，它剥削和压迫工人并产生不平等，也就是说，它是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它结束剥削和压迫并给工人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将使经济领域民主化。因此，社会主义是手段，而民主是目的。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只是通向目的的一种设计。如果它不能带来所期望的目的，这绝对不会使民主本身失去可信度。它只是意味着必须寻求别的方式。

如果这种主张被接受，那么也许这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到，民主不是美国政府利用禁运等压力方式从外部强加给中国的“美国体系”，而是中国人民在过去 100 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历尽巨大的、痛苦的和英勇的斗争而力求达到的重要价值。

本书认为，马克思从未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发展道路”。正是列宁在掌握政权后，在发现苏维埃国家的工业革命还是一片空白时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这种转换（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很根本的）。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这种解释的读者也能够发现，我这样做是在力图回到马克思的伦理观的根本上去。而且，这本书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很清楚地把握到“压迫的意志”和“剥削的意志”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被物化进机器和生产结构之中。这便利了恩格斯、列宁和以后的理论家这样主张：工厂中自由的缺乏不可避免，工人对它的反抗是错误的。我相信，对机器的神秘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工业机器并不简单是既可以用于好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的中性工具。机器已经嵌入了深刻影响操作机器的工人的伦理选择（例如效率）。这意味着，工人民主化这一历史任务（工人的解放）必须包括“机器”的“去神秘化”和“去物化”。如果关于机器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它也适用于作为今天中国工业化基础的机器。因此中国读者可能发现这本书的有些内容和他们今天的情境还是有关系的。

最后我要感谢翻译和编辑《激进民主》中文版的朋友，特别要感谢刘元琪，他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

道格拉斯·拉米斯

2002年7月24日



致 谢

这本书第一稿的大部分写于1987—1988年我离开津田塾大学度假期间。我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在菲律宾大学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度过了半年时间。我感谢第三世界中心以及当时的主任伦道夫·S·大卫 (Randolf S. David)，他不仅给我提供了访问学者的资格，而且给我提供了最难得的优待——在图书馆可以有一张桌子。在那段时间中，我不仅和伦道夫·S·大卫，还和该中心副主任辛西娅·鲍蒂斯塔 (Cynthia Bautista)，以及P.B. 阿宾内尔斯 (P.B. Abinales)、亚历山大·马格罗 (Alexander Magno)，还有该中心别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我还有很好的机会能和萨尔瓦多·卡洛斯 (Salvador Carlos) 一起

教一门政治理论课程，并在和他的对话中受益良多。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也发起了三次讲演，在这过程中我拿出了本书前三章的第一稿，而且我收到了对这些讲演稿的生动的、有思想的批评。我特别地要感谢雷诺多·拉卡萨 (Reynoldo Racasa)，他不但租给我们一个房间，而且从他的餐桌上我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有关菲律宾政治和社会的知识。

1988年下半年，我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变迁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对于这一决定我感谢该研究所及其主任特洛伊·达斯特 (Troy Duster)。该研究所发起了一次讲演，在那次讲演上，我得以拿出第二章的第二稿。在那段时间中，R·杰弗里·勒斯蒂格 (R. Jeffrey Lustig) 让我们住在他在伯克利后院的小屋中，他阅读我的稿子，提出富有帮助的批评。多谢杰弗里！

下一个我必须提到的团体要指明明白有一点困难，因为它没有名字。这是一个界定相当模糊的研究团体，其成员只是不定时地碰面，最初是由伊凡·伊里奇 (Ivan Illich) 组织的。在1988年和1989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990年于得克萨斯的豪斯顿，我分别有幸加入这个团体。这些会议的结果是《发展词典：作为权力的知识的指南》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ed. Wolfgang Sachs, London: Zed Books, 1992)。我给那本书撰写的部分 (“平等”，38~52页) 和本书第二章相当部分是重合的，我非常受益于那些会议上的对话。我要特别感谢的不仅仅有伊里奇和萨克斯 (Sachs)，而且有哈里·克利弗 (Harry Cleaver)、巴巴拉·杜登 (Barbara Duden)、古斯塔沃·埃斯蒂法 (Gustavo Esteva)、阿什斯·南蒂 (Ashis Nandy)、马奇德·拉赫利玛 (Majid Rahnema)、琼·罗伯特 (Jean Robert) 和特奥多·沙宁 (Teodor Shanin)。

影响这本书的另一实际经历是我参加了对1989年夏季在日本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规划，这些会议称为“为21世纪的人民计划”，特别是参与了一年之久的讨论——这些讨论后来形成《水俣宣言》。我特别要感谢我在亚太资源中心的同事武藤一羊 (Muto Ichiyo)，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受民族国家限制的民主或解放理论，至少在历史上的此时是一个贫乏的理论。

而且，在津田塾大学和我的同事三浦永光 (Miura Nagamitsu) 共同教一门课程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启发——我们共同设计的这个课程是关于进步理论的批判历史的。

下述一些人细致地阅读手稿并提出有见地的批评：除了勒斯蒂格之外，

还有弗兰克·巴达克 (Frank Bardacke)、汉娜·皮特金 (Hanna Pitkin)、约翰·沙尔 (John Schaar) 和马克·塞尔登 (Mark Selden)。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鼓励可以说是我的精神食粮。我要特别感谢杰弗里·伊萨卡 (Jeffrey Isaac)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外审读员，他提出了有帮助的、建设性的建议。我在“导言”中也表示了对马洛·肯瑞 (Muro Kenji)、鹤见俊介 (Tsurumi Shunsuke) 和谢尔顿·沃林 (Sheldon Wolin) 的感谢。

我衷心地感谢藤原淳子 (Narahara Junko) 和山香淳子 (Yamaga Junko) 的内行的打字。

我感谢我的父亲——基思·拉米斯 (Keith Lummis)，他给了我很多，其中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本书的题词：

“你不必精明，你所有要做的是停下来，思考。”

通常，一个男作家致谢最坏的时刻在最后到来——当他感谢有耐心的妻子时。这里，我感谢我的妻子——斋藤靖子 (Saito Yasuko)，不是为了其耐心而是为了她没有耐心。她以这样一种方式帮助我继续我的计划：她偶然问：“什么？你还在忙那件事情？”

你也许会想：有这些帮助，这本书将比原来的手稿好得多。如果事实与此不符，读者知道该责怪谁。

这本书的萌芽是我的文章《民主的激进主义》，发表在《民主》杂志第2卷第4期（1982年秋季号）。这篇文章也以日语发表于《日本的激进宪法》(Tokyo: Shobunsha, 1987) 一书中。第二章最初以《反对民主的发展》的题目发表在《替代：社会转化和人的治理》第16卷第1期（1991年冬季号）。第五章曾被收入为庆贺伊凡·伊里奇的60岁生日而编的《朋友书，纪念册》一书中。我感谢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允许我用这些材料。

道格拉斯·拉米斯

本书力图通过重新建构民主观念，使民主重新有利于人民和左翼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往往将民主等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政治制度，而事实上后者在很多领域是反民主的。作者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如美国反越战运动、菲律宾的反马科斯运动、墨西哥的恰帕斯自治运动等的经验，主张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种目的，形成面对面的小群体，以普遍价值相号召，争取在社区、工作场所和第三世界的本土尽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和自治，壮大公民社会，建立自由空间，逐渐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消亡，从而既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又可以代替传统左翼的权威主义的组织方式。作者认为，这样的民主重建可以使左翼发现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并使左翼重新获得目标和号召力，这样，民主将再次和人民站在一起，有利于人民，这样的民主就是激进民主。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H.W. 64/05"

道格拉斯·拉米斯 (C.Douglas Lummis) , 1936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 后来长期任教于日本津田塾大学政治学系。拉米斯学生期间曾受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理论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传统的影响, 并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家伊凡·伊里奇交往颇多。拉米斯曾经积极参加过反越战运动, 并考察过很多民主运动,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菲律宾民主运动。拉米斯力图重新发现民主和左翼之间的亲和关系, 寻找一种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视角, 探索一条新的反资本主义道路。

策划编辑 高自龙
责任编辑 吴楚克 林 坚



COVER DESIGN TEL: 010-82631607
by 表顿设计 / 蒋宏工作室
JIANGHONG STUDIO

海凝

版式设计 王坤杰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李景源 叶汝贤 陈学明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郑一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治河 刘元琪 李惠斌 杨金海 余文烈

陈振明 陆 俊 欧阳英 曹荣湘 鲁克俭